

培训的两位国际专家之一,参加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印度举办的为其他相关国家的项目官员和政府与非政府合作伙伴进行的培训。联合国人口基金希望未来几年,国际间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交流,因此也积极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筹备在中国举办国际研讨会和交流培训,邀请相关国家来中国交流经验,共同讨论应对性

别比失衡的对策。

中国正处在一个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治理人口结构失衡、促进性别平等、满足各类脆弱人群的需求等方面还面临着各种挑战,联合国人口基金将继续支持中国应对这些挑战。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4)06-0024-03

中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视角:“预前”与“预后”

陆杰华 张 韵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性别结构的平衡不仅关系到个人、家庭、人群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及其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安交通大学李树茁教授所主持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全新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很多有创新性的结论。我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既要做好“预前”的防范措施,也要做好“预后”的治理措施,标本兼治全面治理性别比失衡问题。

一、从性别比的治理到性别失衡的治理

多年来,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性别结构的平衡不仅关系到个人、家庭、人群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及其可持续发展。性别比失衡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是由于性别比失衡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加重不发达地区的贫困、增加单身男性的婚配压力并且产生大量男性弱势群体等等。以往学界对性别比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尤其是在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男孩偏好问题,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等领域均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但是却对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够,相关的战略研究更为少见。西安交通大学李树茁教授所主持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而且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从多维视角切入,

运用社会学、人口学、公共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的视角对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报告中对性别失衡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并从公共治理与实践的角度对性别失衡的治理进行了超前的战略设计,这是课题报告的一大亮点。

(一) 性别失衡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

对性别失衡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的研究是该报告的核心内容。研究通过微观、中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性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风险如何影响个人、家庭、人群和社区的社会失范和公共安全,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支撑这一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宏观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微观层面的面向个人和社区的大型专项社会抽样调查、面向相关管理机构的专项公共政策调查以及相关政府机构的政策文件等。所有数据均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多样性,既涵盖了宏观层面的权威性数据,又有针对性极强的中微观数据。从研究方法上看,该研究综合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包括人口学、社会学、公共政策与管理等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综合分析和全面把握研究问题,具有很好的创新性。与此同时,报告对性别失衡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的研究成果颇为新颖,预估了性别比升高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微观层面研究了男性婚姻挤压的总体态势与脆弱性问题,宏观层面探讨了性别失衡下社会失范、风险传导放大及其对公共安全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消极影响。

(二) 性别失衡的治理制度设计

除了研究规范、数据丰富以及方法创新外,该研究

还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以及良好的应用性。该研究在总结和分析当前性别比失衡治理工作绩效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视角,着眼于国家治理工作模式的提升,创新了涵盖性别失衡的原因、现象和后果治理的整体性治理框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战略,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公共治理制度的整体设计。研究报告的另一大亮点是区分了性别失衡风险的“根源性治理”与“缓解性治理”。其中“根源性治理”立足于通过利益倾斜引导女性地位的提高来改变传统的“男孩偏好”,以此从根源上解决性别失衡问题。“缓解性治理”则旨在积极应对已经出现的性别失衡下的各类社会风险,缓解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二、从性别失衡的治理转向性别平等的公共治理

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主要包括制度分析、政策研究、社区实践和治理模式、战略设计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按照顺序形成一个完整的环节,分别从性别失衡的原因、性别失衡治理政策预测与仿真、性别失衡治理在不同地区的实践情况和性别失衡治理的战略设计等角度全面地讨论性别比失衡的公共治理策略。造成性别失衡的原因可以从文化制度、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多维度进行分析,从性别失衡的原因出发来进行性别失衡的治理可以起到“孕前”的作用,将性别失衡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从源头上控制住。而现实情形下,性别失衡已经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因此,我国不仅要从源头上把控性别失衡的进一步恶化,还要对性别失衡造成的既成的以及潜在的社会风险进行“产后”的公共治理。

(一) “产后”: 性别失衡的后果预防

性别失衡可能造成的风险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察。从宏观上看,性别失衡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女性的缺失,其连带效应包括男性过剩风险、人口数量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风险,等等。女性的缺失会导致一定数量男性婚配的困难,家庭数量的减少进而影响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最终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加重人口老龄化的负担。因而,宏观上的“产后”措施应当首先关注男性“过剩”的数量和规模。这一数量和规模的“过剩”男性人口将面临的困难包括独自赡养老人以及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公共治理上,尤其需要政府加大养老和医疗上的投入。因此,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和社会医疗体系,并且在基本保障的基础上适度向弱势

群体倾斜。从微观上看,性别失衡还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家庭是社会中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大量的“过剩”男性长期单身无法组建家庭,一方面,导致单身男性身心健康受到一定的影响,在生理和心理双重压力下做出危害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嫖娼、强奸、同性恋等;另一方面,单身男性出于家庭、社会的压力采取买婚、骗婚等极端手段满足自身对婚姻的渴望。因此微观上的“产后”措施需要从对大龄“剩男”的心理疏导着手,加强社区卫生安全教育,同时,加大对大龄“剩男”的生活扶持以及给予其必要的文化教育支持,构建和谐社区环境,为大龄“剩男”提供轻松的社会氛围。

(二) “孕前”: 性别失衡的源头治理

与“产后”的治理不同,对性别失衡的“孕前”措施的着眼点在于从根源上解决性别失衡的问题,性别失衡的根源在于性别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在我国由来已久,其中既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社会制度因素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性别选择行为,尤其是在男孩偏好强烈的地区,性别选择行为尤为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制度体系中的种种利益偏向也助长了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当前,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性别失衡,就要从性别平等的公共治理着手,通过政策手段保护女性权利,促进女性发展,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将性别平等视角引入到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中去,从政治、教育、劳动市场、健康服务等方面保障男性和女性同等的机会;在文化宣传中倡导性别平等概念,改变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除了从观念上实现性别平等外,我们要扭转性别失衡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应对当前各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综合治理。如加强立法,减少危害女性权利的“两非”行为,打击性别选择行为;同时,积极强化治理机制建设和加强组织领导,提升治理能力以及建立问责机制。

(三) “孕前”与“产后”: 治本还是治标

性别失衡的“孕前”措施倾向于从根源上实现性别平等,从而解决性别失衡问题;而“产后”措施则是具有针对性地对性别失衡所产生的风险后果的缓解和治理。前者意义在于“治本”,后者意义在于“治标”。当前,我国出生性别比连续升高,性别失衡问题累积较为严重,而仅在“治本”上下功夫并不能完全应对已经产生或将要发生的社会风险。因此,要治标与治本兼顾,积极做好“产后”的应对措施,化解可能产生的不

稳定因素,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此外,“预后”措施大多涉及如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基础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实现公共治理效益的最大化,所投入的成本与实际效益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考虑。我们需要正视的是,由于解决性别失衡问题的根源在于“治本”,因此只有推动性别平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性别失衡。性别平等既要我们从观念上改变传统的男孩偏好,又要在政策和制度体系的建立上保障男女同等机会的实现;性别平等既是解决性别失衡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标志。我国为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的公共治理是势在必行。

三、总结与讨论

对于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我们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如韩国在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上做过很多有益的尝试,对中国解决相关的人口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韩国针对性别比的公共治理主要依靠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努力;二是公民社会的推进作用;三是各种政策的综合性作用。政府要通过采取各种法规和政策提高妇女地位、促进性别平等,公民社会则在政府的协调下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充分发挥自己在促进性别平等中的作用;并通过向社会长期不懈地宣传倡导,对传统的男孩偏好转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努力下,韩国的性别比失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通过借鉴韩国的性别比治理经验,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加大性别比失衡治理的力度。第一,需要确定治理策略的重点和路径选择;第二,要注重法律和法规的变革;第三,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有待加强;第四,要靠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从这四个角度出发统筹推进,综合治理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

有效控制,并保持稳步下降的态势。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不言而喻。人口安全既维系着社会稳定,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需要对人口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以其详实的内容和规范的研究在性别结构失衡问题领域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为我们全面描绘了性别失衡的态势、机制以及未来可行的战略计划。中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任重道远,我们需要立足于“预前”治理,即从“治本”上推动社会中的性别平等观念加强性别平等的政策保障;同时也要兼顾“预后”的措施,即在“治标”上完善社会制度体系,缓解性别失衡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参 考 文 献]

- [1] 王顺安. 性别比失衡引发违法犯罪问题研究[J]. 河北学刊 2009(2): 280-312.
- [2] 邱红. 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性别分析[J]. 人口学刊 2007(5): 15-18.
- [3] 张仕平, 王美蓉. 性别价值观与农村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J]. 人口学刊 2006(2): 13-18.
- [3] 李慧英. 男孩偏好与父权制的制度安排——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性别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12(2): 59-66.
- [4] 杨雪燕, 李树茁, 龚怡.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男孩偏好: 基于治理的视角[J]. 妇女研究论丛 2010(6): 27-33.
- [5] 张翼.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原因与对策[J]. 社会学研究 1996(6): 55-68.
- [6] 汤兆云.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因素分析[J]. 人口学刊 2006(1): 25-31.
- [7] 韦艳, 梁义成. 韩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公共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J]. 人口学刊 2008(6): 15-22.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4)06-0026-03

创新科学研究 治理人口性别结构失衡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学系 北京 100872)

2004年,美英学者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M. Hudson)和安德烈亚·博尔(Andrea M. Den Boer)联合出版了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著

作。在这部名噪一时的著作中,作者利用中外历史事例,阐释了男性人口过剩可能对社会安全带来的威胁,认为过多的年轻男性光棍不仅引发国内和国际动乱,